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中国经济转型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书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在政府行为方式适应市场化转变、非国有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产品市场发育、金融市场化等方面的市场化进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尝试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之中，为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合理的“制度”解释。本书对推进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 康继军 著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Growth in Economy Transformation Period of China

中国区域可持续发展文库

中国转型期的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 康继军 著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Growth in Economy
Transformation Period of China

中国区域可持续发展文库

中国转型期的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转型期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 康继军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中国区域可持续发展文库)

ISBN 978-7-03-023573-2

I. 中… II. 康… III. ①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1978~2003
②经济增长—研究—中国—1978~2003 IV.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2257 号

策划编辑: 胡升华 侯俊琳

责任编辑: 牛玲 宋旭 苏雪莲 / 责任校对: 宋玲玲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无极书装

编辑部电话: 010-64035853

E-mail: houjunlin@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9年3月第一版 开本: B5 (720×1000)

200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6

印数: 1—2 500 字数: 295 000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前 言

本书以改革开放为背景，通过考察改革开放 30 年来经济体制各方面市场化进程的相对程度，分析和研究了我国转型期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008 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30 周年，回顾历史，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是以实践经验为先导（俗称“摸着石头过河”）的一步步摸索推进的渐进式改革。自 1978 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更大程度的开放性和更多的市场自由。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转折阶段，从以试验性、分散性、利益引导、破坏旧体制为主要特征的“感性发展阶段”向以系统性、主动性、制度创新、建立市场经济框架为主要特征的“理性推进阶段”转型。迄今为止，中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不完善，改革的攻坚任务尚未完成。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是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正如胡锦涛同志 2008 年 1 月 1 日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要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对改革开放进行系统回顾总结，以生动的事实、伟大的成就、成功的经验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坚持改革开放的教育，深刻领会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深刻领会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因此，现在正是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经验事实加以回顾和总结的大好时机。

经济增长是增进人类福利、促进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传统主流增长理论大多忽视了对制度因素的研究，而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与增长关系的研究又缺乏严密的数理演绎和分析。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连续30年保持了平均9.7%以上的高速增长，成就举世公认。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之源是什么？

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国家或地区间差异是经济研究的重要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直接源泉是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以及包括技术进步的“其他因素”。但是，是什么因素决定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以及技术进步？经济学家们现在把潜在决定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水平）的第二层次（或“深层次”）的因素概括为三类：地理、开放和制度。这是学者们目前探讨经济发展较深层次原因时归结的三类因素，相应地产生了地理假说理论和制度假说理论。本书分析的焦点是包括开放和制度因素变革的“经济转型”。

鉴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事实明显与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密切相关，因此对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本书对中国转型期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在对现有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经验研究方法加以总结的基础上，本书使用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和前沿动态计量经济学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对实证研究结论进行经济学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书的篇章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首先，本章阐述了全书的研究背景及目的。其次，针对不同学者在如何定义、测度和评价“经济转型”、“制度变迁”、“市场化进程”等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本章对书中所涉及的关键概念进行了界定，在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基础上提出了本书的结构与研究方法，并对本书的主要贡献与创新之处加以说明。

第二章为制度变迁理论评述。本章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制度变迁模型以及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进行了回顾和评述，总结了现有制度变迁经验研究的方法和手段。

新制度经济学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理解经济增长，认为提供适当个人激励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North，1993），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然而，已有文献中有关制度变迁的研究都是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中进行的，因此，制度变迁理论通常并不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经济学有关经济转型的研究通常采用改革实施的连续性来界定成功的方法，而不管改革的性质如何（Pereira et al.，1993）。此类研究方法认为评价制度成功与否的标准在于该制度能否被采纳并实施那些体现制度设计者最终设想的政策。但是这种方法更多体现的是行政体制的效率问题而非经济改革的基本依据。正如 Peters（1999）所指出的，“即使这些制度被确定为以某种经济思想为基础，也无法根据其应用经济思想的程度对其进行评估”。

第三章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量化测度。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使用索洛余值法来测度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认为经济增长中扣除资本和劳动贡献后的剩余是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广义技术进步总贡献扣除技术创新贡献后的剩余。本书以经济转型期间中国总体和重庆市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索洛余值法和计量经济分析方法量化测度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数据方面，本书对统计数据在时间维度上进行了补充和整理，同时在人力资本等宏观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挖掘和使用上有所创新。在计量模型方面，本书使用 Cochrane-Orcutt 迭代方法来对自相关进行修正，在计量模型的处理上更加完善和可靠，使实证的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在经济转型的研究方法中，除了制度经济学用改革实施的连续性来界定成功的研究方法和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索洛余值法之外，另一种为学术界广泛采用的方法是使用各种评价制度变迁的指标体系来衡量转型的总体水平，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6）设计的经济自由化累积指数（cumulated index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以及美国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自由之屋（Freedom House）和加拿大的 Fraser 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等三家机构各自编制的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其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自由度进行评分和排序。

由于这种研究方法可以量化测度改革的进程，所以为大多数研究机构和学者

所采用。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包含了许多错误的假设^①。首先，此类研究方法假定所有国家都朝着同一方向发展，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各国具有共同转型目标的错误假设。其次，由于此类方法所采用的被视为客观的、可量化的变量，实际上在主观判断上往往可以有多种解释，因此其指标可靠性的假设是有争议的。再次，此类方法大都假设所采用的指标覆盖了转型的全过程，而事实上指标体系中的许多分指标只能应用于转型过程的部分阶段。最后，这种方法假设统一的衡量标准在所有国家和地区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然而，尽管存在上述诸多缺陷，本书仍将应用建立评价制度变迁程度指标体系的方法进行研究。由于本书研究的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程度，前述假设在本书的研究中是完全合理的。另外，本书仿效Pereira等（1993）“保持怀疑直至经济在民主条件下显现出增长的迹象”的方法，提出一个尝试性的市场化相对指数，当转型的增长贡献得到证实的时候，这一指标体系的可靠性和合理性将得到验证。

按照这个思路，并针对第三章使用索洛余值法来间接测度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存在的不足，本书在第四章至第七章分别对政府行为方式适应市场化转变、非国有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产品市场发育这四个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过程的主要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构建了测度这四个方面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指标体系，并运用协整分析和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的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方法对各方面市场化进程分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证实本书所建立的测度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四个方面的分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变量（组）之间的因果关系在长期、短期以及因果关系方向上存在差异，说明经济体制市场化各方面的进程是不均衡的，各自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不同的。

第八章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第四章至第七章研究的经济体制变革的4个方面不同，金融制度改革与金融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与此同时又取得了金融资源的高增长。本书使用季度数据，从直接金融（股市发展）和间接金融（金融中介的发

^① 参见张曙光和赵农（2000），舒元和王曦（2002），诺格德（2006），康继军、张宗益和傅蕴英（2007a）等的评论。

展)两个方面来衡量金融发展,对中国、日本、韩国三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实证结果证明,中国、日本、韩国三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上均有差异,说明经济环境和金融制度的差异在解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九章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模型。在第四章至第七章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四个方面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基础上,本章从政府的职能身份转换和从微观经济活动中的退出、推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高经济的开放程度、培育产品市场4个方面,以19个指标为基础构造了衡量中国经济转型(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制度变量——市场化指数,从该指数的数据特征和图形分析的结果看,新构建的指数较好地描绘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然后,本章将该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变量,运用协整理论和动态计量经济学“从一般到特殊”的动态建模方法建立了一个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模型,该模型较好地模拟了市场化影响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变化规律。实证研究结果证实了短期(转型期)内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能量释放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也证实了资本和劳动仍然是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第十章对全书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展望。

本书的主要创新如下:

首先,将本书新构造的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变量,运用协整理论和动态计量经济学“从一般到特殊”的动态建模方法创新性地构造了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动态模型,较好地模拟了经济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变化规律。实证研究的结果证实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确实部分来源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能量释放。

其次,构造了衡量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的指标体系,并构建了“市场化相对指数”这一“制度变量”。在对外开放程度方面的指标体系设计和计算方法上有较大创新,对其他方面指标体系的设计、数据挖掘和处理也较以往的研究有所改进和完善。从数据特征和图形分析的结果看,新构建的指数较好地描绘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

最后,本书对政府行为方式适应市场化转变、企业市场化(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产品市场发育、金融发展这五个中国经济转型的最主要方面进

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实证研究中大量运用了新近发展的高等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了经济体制改革各个方面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本书的正文部分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附录 A 至附录 C 是作者与合作者共同在对中国转型期制度变迁研究基础上撰写的三篇应用研究论文，傅蕴英博士、陈邦强博士、吴俊博士和作者的导师张宗益教授参与了这三篇论文的研究工作。

希望本书可以为研究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问题提供些许借鉴。

康继军

2008年7月18日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1
一、研究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	1
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概念	4
(一) 转型经济学	4
(二) 经济转型	4
(三) 经济增长	4
(四) 制度	5
(五) 制度变迁	5
三、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现状	6
(一) 新制度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增长理论	6
(二)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定量测度	9
(三) 制度变量的指标体系和指数	12
四、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14
(一) 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	14
(二) 研究方法和特色	15
第二章 制度变迁理论评述	19
一、制度理论	20
(一) 制度的定义、产生及其功能	20
(二) 制度理论的行为假定	21
(三) 制度理论的核心——产权方法	22
(四) 制度的构成	23

二、制度变迁理论	24
(一) 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	25
(二) 制度变迁的轨迹与路径依赖	27
三、制度变迁模型	29
(一) 诱致性制度变迁	29
(二) 强制性制度变迁	32
(三) 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的比较	33
四、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	34
(一) 理论分析	35
(二) 建立模型	36
(三) 实证检验	37
第三章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索洛余值法的计量经济分析 ..	39
一、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39
二、测度制度变迁贡献的计量模型	40
(一) 经济增长中要素贡献的测度模型	40
(二) 经济增长中制度变迁贡献的量化测度模型	42
三、测度中国转型期(1978~2003年)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43
(一) 数据的收集及处理	43
(二) 中国转型期(1978~2003年)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结果	48
(三) 结论	49
四、测度制度变迁贡献的实证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50
(一) 数据的收集及处理	51
(二) 重庆市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结果	54
(三) 结论	56
五、本章小结	57
第四章 政府行为方式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	58
一、中国转型期(1978~2003年)政府经济管理系统改革进程	58

二、政府行为方式市场化进程的内涵及理论边界	62
三、测度政府行为方式市场化进程的指标体系	64
(一) 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	64
(二) 政府职能身份转变指标	65
(三) 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指标	66
四、中国转型期(1978~2003年)政府行为方式市场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 实证研究	66
(一) 数据与变量	66
(二)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67
(三) 协整检验	68
(四)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确定	69
(五)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72
(六) 脉冲响应函数	73
(七) 方差分解	75
(八) 结论	77
五、本章小结	78
第五章 企业的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79
一、中国转型期(1978~2003年)企业市场化进程	79
二、企业市场化进程的内涵及基本理论	81
三、测度企业市场化进程的指标体系	84
四、中国转型期(1978~2003年)企业市场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 研究	86
(一) 数据与变量	86
(二)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87
(三) 协整检验	88
(四)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确定	89
(五)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92
(六) 脉冲响应函数	94
(七) 方差分解	96

(八) 结论	97
五、本章小结	98
第六章 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	100
一、中国转型期 (1978 ~ 2003 年) 对外开放进程	101
二、测度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体系	103
三、中国转型期 (1978 ~ 2003 年) 对外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107
(一) 数据与变量	107
(二)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108
(三) 协整检验	109
(四)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确定	111
(五)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117
(六) 结论	121
四、本章小结	122
第七章 产品市场的发育进程与经济增长	123
一、中国转型期 (1978 ~ 2003 年) 产品市场发育进程	123
二、测度产品市场发育进程的指标体系	126
三、中国转型期 (1978 ~ 2003 年) 产品市场发育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127
(一) 数据与变量	127
(二)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130
(三) 协整检验	130
(四)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确定	132
(五)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134
(六) 脉冲响应函数	135
(七) 方差分解	136
(八) 结论	137
四、本章小结	138
第八章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141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141
二、理论分析	143
三、实证研究	146
(一) 模型设定和计量方法说明	146
(二) 样本数据指标说明	147
(三) 单位根和协整检验	148
(四)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与 Granger 因果检验	150
四、本章小结	155
第九章 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动态模型	157
一、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	157
二、市场化指数设计	161
三、模型分析、指标及数据处理	165
四、实证研究	171
五、本章小结	175
第十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77
一、本书的主要结论	177
二、未来研究展望	179
(一) 关于量化测度制度变迁指标体系	179
(二) 关于包含制度因素的宏观经济建模	180
参考文献	182
附录 A 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金融结构、政府行为、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间 的关系研究	198
附录 B 中国经济转型期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行为研究——兼论《巴塞尔协议》 在我国的实施效果	219
附录 C 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货币需求模型	230
后记	238

第一章

绪 论

一、研究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

经济增长是增进人类福利、促进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探求经济增长的源泉并采取措施释放生产力,是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永恒的主题。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增长率大不相同,如何对此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是人们寻找经济增长源泉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现代经济学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及制度变迁理论都对经济增长源泉及内生机制进行了分析,这些解释包括要素的积累、资源的配置、技术进步、宏观经济稳定、教育水平、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法律有效性、国际贸易,甚至宗教信仰的差异,等等。不仅如此,种种新的解释还在继续提出,对经济增长源泉的探求似乎永远都不会停止。

近年来,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都逐渐将注意力放到了社会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复杂关系方面。对于如何引导中央集权管理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制度分析的意义至关重要。正如诺思^①、张五常等(2003)所指出的,“许多学者现在认识到主流经济分析,即新古典经济学无助于重构缺乏牢固市场的经济;同样的批评适用于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明显涉及制度、制度变革与经济绩效之间联系的一个交叉学科研究规划正在浮现”,“新制度分析是一种背离但不是抛弃新古典经济学的细致研究”。

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进行制度创新是中国必须解决的且最为紧要的根本问题,因为制度是经济增长

^① 诺思,即 Douglass C. North,亦常译作诺斯。

的源泉。这不仅仅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同时也为中国的改革实践所证实，“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解读的就是制度的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指出，一个节省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制度框架和制度创新的空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国家的基础制度、制度结构、制度框架、制度环境和制度走向决定了该国的经济绩效。

创新是人类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支柱。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创新最主要的内涵和组成部分。但“创新”又不仅限于技术领域的创新，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主要动力。实际上，“创新”学说的首创人、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1990）等著作中提出“创新理论”时指出，“创新”的概念是一个经济加技术的范畴，不仅指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更是指将已发明的科学技术引入企业之中，形成一种新的生产能力。他认为创新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①创造新的产品或提供产品的新品质（产品创新）；②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工艺创新）；③开辟新的市场（市场创新）；④获得新的供给来源（资源开发利用创新）；⑤实行新的组织形式（体制和管理的创新）。熊彼特提出的创新概念的含义是相当广泛的，它包括了一切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创新活动，包括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组织、金融和商业的一系列活动。因此，除了技术创新，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诸多方面（李京文，2001）。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到现在的30年，是举世瞩目的30年，尽管改革开放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波折和反复，但是30年来中国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使中国经济的面貌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中国的国民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稳步上升，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因此，总结3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弄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程度），定量地测度制度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十分必要和意义重大的。

事实上，正如陈宗胜（1999b）在其重要著作《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中所指出的，“如果分析技术成熟且测算方法熟练，对体制改革进程的测度应当比较经常地进行”。各种研究制度变迁、制度变革、制度创新、市场经济和市场化的文献很多，但是对于中国经济转型过程的制度变迁及市场化程度进行定

量测度的研究却并不多。自从卢中原和胡鞍钢（1993）首次提出市场化指数以来，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献只有寥寥的几部，在此基础上仅有极少的文献研究了制度变迁（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对于市场化程度的测度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尽相同的测算指标和加权汇总方法，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从卢中原和胡鞍钢（1993）首次提出市场化指数到现在，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远非无懈可击，几种主要的研究成果的最终结论相差很大，对于市场化进程的测度以及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

方法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1980年，以克莱因教授为团长的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在北京颐和园举办了后来被称为“颐和园讲习班”的“经济计量学讲习班”，成为中国计量经济学发展历程的标志性事件。20多年来中国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在吸收、借鉴国际同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得到发展，但是在具体应用上推广得还不够。在市场化进程研究方面较新的进展是樊纲等（2001，2003，2004）借鉴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和《华尔街》（*The Wall Street*）杂志的方法（Miles et al., 1995~2004）使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权重构造市场化指数，不依赖于“专家评分”等主观因素，较之前的研究更加客观，该文构造的市场化指数，如其所说，“价值就在于它可以作为一个‘制度变量’”。然而，由于数据的局限，樊纲等的研究仅仅考察了中国1999年以来各个地区的相对市场化进程，未能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变迁和市场化进程作出整体的量度。同时，由于方法上的局限，其所构造的市场化指数在不同年份之间是不可比的。此外，国内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和国际上存在较大的差距和分歧。

迄今为止，改革已经推进到第30个年头，较前人的研究，时间上已经有了足够的长度，可以使用更加科学合理的计量方法构造制度变迁的测度变量，从而定量分析经济制度变迁的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诚然，正如陈宗胜教授所言：“重要的不是数值本身，而是这些数值数列所反映出来的变动趋势。”

本书以“中国转型期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为题进行研究，希望在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建立制度变量指标体系，构建包含